

唐代

TANG DAI
JIAO SHU LANG YU WEN XUE

校书郎与文学

黎文丽◎著

唐代

詩歌研究

卷之三

唐詩研究

卷之三



唐代 校书郎与文学

TANG DAI
黎文丽◎著
JIAO SHU LANG YU WEN XUE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唐代校书郎与文学 / 黎文丽著. —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14. 7

ISBN 978 - 7 - 5161 - 4650 - 7

I. ①唐… II. ①黎… III. ①古典文学—编辑工作—中国—唐代
IV. ①I206. 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4)第 186043 号

出版人 赵剑英
责任编辑 张林
特约编辑 金泓
责任校对 高建春
责任印制 戴宽

出 版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社 址 北京鼓楼西大街甲 158 号 (邮编 100720)
网 址 <http://www.csspw.cn>
中 文 域 名 : 中国社科网 010 - 64070619
发 行 部 010 - 84083685
门 市 部 010 - 84029450
经 销 新华书店及其他书店

印 刷 北京市大兴区新魏印刷厂
装 订 廊坊市广阳区广增装订厂
版 次 2014 年 7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4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710 × 1000 1/16
印 张 17.75
插 页 2
字 数 291 千字
定 价 56.00 元

凡购买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图书，如有质量问题请与本社联系调换
电话：010 - 64009791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序　　言

唐代政治制度与文学是近几年来唐诗研究界较热的一个领域，黎文丽博士将其《唐代校书郎与文学》书稿呈于我，嘱为书序，我非常高兴。一来唐代政治制度与文学的研究我十分关注，二来文丽是我的博士研究生，书稿即是当年的博士论文。不过，毕竟毕业几年了，今天细读此稿，较几年前的博士论文已大有改进，甚为欣慰。

校书郎的设置，是中国古代士大夫政治文化的一个重要特色。士大夫不仅是政治主力，也是文化主体，他们在从政之前或为政之中，文化素养都是其立身之本。书，作为体现士大夫文化素养的标志，自然也就成了士大夫联系文化与政治的桥梁，而校书郎就是构筑这桥梁的基石。唐代校书郎的设置较前代有较大的区别，“自汉、魏历宋、齐、梁、陈，博学之士往往以他官典校秘书。”（《唐六典》卷二六）博学之士已具有较高的政治地位，再以“他官”任此职，是荣誉和政治地位的体现。而唐代校书郎则是九品级的官员，是士人释褐起家的基层官阶。但作为政治桥梁，校书郎这一低品级的官职则在唐人政治生涯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是颇受时人向往的清望之官，所以杜佑《通典》称校书郎“为士人起家之良选”，是“美职”，而检点唐代官场，诸多位至宰相的达官，也都是经校书郎而晋升的。

值得关注的是，唐代许多杰出的文学家，也都有任校书郎的政治经历，从张说、张九龄，到白居易、李商隐，都能看出唐人文学家与校书郎的密切关联，因而研究唐代校书郎与文学也是一项切合唐代文学实际的工作。所以，当黎文丽确定这个博士论文选题的时候，我和当时导师组的老师都予以肯定。但完成这项跨文史的课题也非易事，首先要找准切入点。从历史的角度对校书郎的研究已经较完备，成果较多，从文学角度的研究

则要在借用这些成果的基础上，从人文情怀和文学创作等方面展开。如白居易任校书郎时所写的那首《常乐里闲居偶题十六韵》：“帝都名利场，鸡鸣无安居。独有懒慢者，日高头未梳。工拙性不同，进退迹遂殊。幸逢太平代，天子好文儒。小才难大用，典校在秘书。”诗歌便真实地再现了刚步入政坛的文人内心的复杂心情，他既有初登“美职”的欣喜感，又有难尽其才的遗憾感，所以“小才难大用”一语，便颇耐回味。一直以来，对唐代文学中的那些与职官相关的作品，人们多从作家生平研究方面予以关注，而对这类诗歌的文学史和文化史意义关注不多，这不能不说这是唐诗研究方面的一大缺失。

应该说，黎文丽博士的这部专著在职官文学的外围研究和文本自身研究方面都下了较大的功夫，在唐代校书郎与文学关系的研究方面有开拓性的贡献。作品第一次全面考察了唐代任校书郎的文学家的仕宦经历，从起家释褐官的特殊地位，分析了唐代校书郎在唐人仕宦中的作用，从而揭示校书郎与文学之关系。其对唐代校书郎的文学素质的研究，结合唐代不同时期的文学思潮，将文人任校书郎期间的创作与唐代文学的发展结合起来，线索十分明晰。而从校讎学的角度研究校书郎与文学创作的关系，则在还原校书郎工作性质的同时，将文人的职使与艺术情趣很巧妙地结合起来，体现了作者对所涉研究领域的熟悉，值得肯定。

职官与文学研究是一项很有中国古代文化特色的学术研究，无论是历史学还是文学领域，关注得越深，越能挖掘出古代文人的政治追求和艺术情趣，立体地展现文人的精神世界，很有意义。愿黎文丽博士在此基础上，展开更深入的研究，取得更大的成果。

傅绍良

2014年3月

目 录

绪 论	(1)
第一节 选题依据	(1)
第二节 学术史回顾	(4)
第三节 研究方法和思路	(9)
第一章 唐前校书郎制度概述	(12)
第一节 校书郎设置之缘起	(12)
第二节 校书郎与起家制度	(16)
一 “起家”的含义	(16)
二 起家制度的演变	(18)
三 起家官任职特点	(21)
四 校书郎成为唐代起家之首选	(24)
第三节 汉代文人与校书郎之文化影响	(27)
一 汉代的兰台与东观	(28)
二 汉代的校书及校书郎	(28)
三 兰台与东观在文学上的影响	(31)
第二章 唐代校书郎制度	(34)
第一节 唐代文馆与校书郎的设置特点	(34)
一 唐代校书郎的设置情况	(35)
二 唐代校书郎的官品及工作环境	(39)
第二节 校书郎的任职途径	(43)
一 科举	(43)

二 门荫	(47)
三 迁转	(48)
四 上书论事或献著述	(48)
五 荐举授官	(50)
第三节 校书郎的政治地位	(51)
一 唐代文馆的变迁决定着校书郎的地位	(52)
二 校书郎体现了入仕的主流	(56)
三 校书郎体现了唐人的仕途期望	(59)
 第三章 唐代校书郎的文学素养	(70)
第一节 校书郎任职制诰的文学分析	(72)
一 任职制诰体现的文学素养要求	(72)
二 校书郎任职的综合素质	(74)
三 任职制诰本身的文学色彩	(78)
四 任职制诰体现文风的演变	(82)
第二节 校书郎的文学素质	(84)
一 校书郎任职出身统计分析	(84)
二 校书郎的文学修养	(86)
 第四章 唐代校书郎的工作与文学的关系	(106)
第一节 校书郎的职务范围与工作情况	(107)
一 校书郎的职务特点	(107)
二 唐代校雠学的发展状况	(114)
三 校雠工作在唐代诗文中的体现	(123)
第二节 校书郎的文学唱和情况	(127)
一 宫廷宴集唱和	(128)
二 私人交游唱和	(132)
第三节 校书郎的工作对文学的促进作用	(155)
一 拓展唐诗的内容	(155)
二 丰富诗歌意象	(158)
三 展现诗才提高诗艺	(160)
四 体现为官心态	(162)

第五章 唐代校书郎的迁转对文学创作的影响	(165)
第一节 校书郎的迁转情况与生存状态	(165)
一 校书郎的迁转情况	(165)
二 校书郎的薪俸待遇	(175)
三 校书郎的生存状态	(180)
第二节 校书郎的政治心态	(182)
一 校书郎的优越心态	(183)
二 校书郎的焦虑心理	(187)
第三节 校书郎迁转中的文学创作	(195)
一 送别诗	(196)
二 政论散文	(202)
三 其他文章	(208)
第六章 唐代校书郎的个案研究	(210)
第一节 王昌龄任校书郎期间的创作与心态	(210)
一 王昌龄任校书郎期间的创作	(211)
二 王昌龄任校书郎时期的政治心态	(212)
三 王昌龄官怨诗体现的诗人心态	(216)
第二节 白居易任校书郎期间的创作与心态	(221)
一 白居易任校书郎期间的创作	(222)
二 白居易任校书郎时期的政治心态	(224)
三 白居易任校书郎期间的闲适心态	(227)
四 白居易任校书郎期间的佛老思想	(233)
第三节 李商隐在秘书省校书期间的创作与心态	(235)
一 李商隐在秘书省的创作	(236)
二 李商隐在秘书省期间的政治心态	(237)
三 李商隐在秘书省期间心态的曲折表现	(241)
结语	(247)
参考文献	(251)
附录	(258)
后记	(273)

绪 论

新世纪的唐代文学研究继续保持良好的发展态势，取得了丰硕的成果。对文学的研究基本上突破了时代背景、思想内容、艺术成就三大块机械、单一的分析方法，注意文学与多种因素的关联，将研究领域延伸到史学、制度、美学、文化学、经济、艺术、哲学、民俗等领域。宏观综合研究的视野有所开拓，研究涉及面广，视角多样，注重从多角度全方位体现唐代文学的内蕴。作家的作品仍然是研究的重点，论文数量较多，涉及的作家面较广，对文论、文体和题材的研究不断深入。唐代文学研究专著选题呈现出多样化的趋势，质量上也有较大的提高。罗时进的《唐代文学研究再拓展的空间》^①就指出唐代文学研究者既要善于坚持本位同时又能够转移领域或方向。适度的转移有利于在文学史发展的广阔视野中发现选题，确定研究立场；适度转移的另一意义，是给唐代文学研究成果一个沉淀期，从而注意吸取其他历史时期、其他学科方向的研究方法和经验“反哺”唐代文学研究。

第一节 选题依据

选择唐代校书郎与文学作为研究内容，主要是基于以下三方面的原因：

首先，唐代文学与唐代政治、文化、制度结合的研究是近年来的一个亮点。从总体上看，唐代文学是政治性十分强的文学，没有一个有代表性的作家是远离社会政治环境的。在影响和决定文学具体形态

^① 罗时进：《唐代文学研究再拓展的空间》，《文学遗产》2007年第2期。

和特征的社会、历史、文化等诸多因素中，政治是一种非常重要的因素。如果我们把制度建设与唐代文人结合起来研究，进一步加强对唐代文化及文学的深刻观照，就能加深对唐代文学的认识和了解，从而凸显唐代文学特有的文化面貌。所以，唐代政治制度与文学的相关选题是具有学术价值的。在唐代科举制度、铨选制度、谏议制度等政治制度背景下，将一类角色文人作为研究对象，进而将文人的政治身份、职事活动与文学活动有机地联系起来，已经成为当前学界的一种重要研究取向。以政治角色文人作为研究对象的学术著作，如傅璇琮的《唐代科举与文学》^①、戴伟华的《唐代幕府与文学》^②、王勋成的《唐代铨选与文学》^③、胡可先的《中唐政治与文学》^④、傅绍良的《唐代谏议制度与文人》^⑤、马自力的《中唐文人之社会角色与文学活动》^⑥等等。这些研究成果为我们多角度地认识唐代社会制度和文学带来富有启发性的思考。因为“唐代文学研究正是通过和政治、经济、历史、宗教等方面的联系向纵深拓进的，这种文化视野中的文学研究，更有利于文学演进规律的探讨和揭示”。^⑦

其次，唐人取得进士、明经或其他做官资格之后，可以担任怎样的官职，过去一直无人研究。这个领域的研究，几乎全偏向中高层官职。如吴廷燮的《唐方镇年表》^⑧、严耕望的《唐仆尚丞郎表》^⑨、张荣芳的《唐代的史馆与史官》^⑩、孙国栋的《唐代中央重要文官迁转途径研究》^⑪、郁贤皓的《唐刺史考全编》^⑫、毛汉光的《唐代给事中之分析》^⑬、胡沧泽的

① 傅璇琮：《唐代科举与文学》，陕西人民出版社 1986 年版。

② 戴伟华：《唐代幕府与文学》，现代出版社 1990 年版。

③ 王勋成：《唐代铨选与文学》，中华书局 2001 年版。

④ 胡可先：《中唐政治与文学》，安徽大学出版社 2000 年版。

⑤ 傅绍良：《唐代谏议制度与文人》，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03 年版。

⑥ 马自力：《中唐文人之社会角色与文学活动》，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05 年版。

⑦ 戴伟华：《文史结合考论兼备》，《江海学刊》2001 年第 2 期。

⑧ 吴廷燮：《唐方镇年表》，中华书局 1980 年校点本。

⑨ 严耕望：《唐仆尚丞郎表》，中研院历史语言研究所专刊之三十六，1956 年。

⑩ 张荣芳：《唐代的史馆与史官》，台湾中国学术著作奖助委员会，1984 年。

⑪ 孙国栋：《唐代中央重要文官迁转途径研究》，香港：龙门书店 1978 年版。

⑫ 郁贤皓：《唐刺史考全编》，安徽大学出版社 2000 年版。

⑬ 毛汉光：《唐代给事中之分析》，文津出版社 1993 年版。

《唐代御史制度研究》^①、郁贤皓及胡可先的《唐九卿考》^②、毛蓄的《唐代翰林学士》^③等专著，都是关于中高层官员的研究。而对低层官员的任职情况、文学创作、职务迁转等所知非常有限。本书拟详考唐代基层文官之一——校书郎的具体情况，梳理唐代士人刚入仕时的一些工作状况和文学创作。校书郎是一种官名，掌校讎典籍，订正讹误。东汉朝廷藏书于东观，置校书郎中。后魏秘书省始置校书郎，唐代秘书省与弘文馆皆置。唐代许多著名诗人都担任过校书郎一职，如：杨炯、张说、张九龄、王昌龄、钱起、吉中孚、李端、郎士元、严维、卢纶、夏侯审、畅当、顾况、刘禹锡、元稹、白居易、杜牧、李商隐、段文昌、丁公著、郑澣、李绅、李翱、段成式、李群玉、韦庄、姚南仲，等等。他们的任职状况和任职心态具有一定的代表性，体现不同时期文士的政治参与意识，同时又多多少少地体现在其文学创作中。

第三，校书郎作为唐代士人初入仕途的一种官职，任职条件要求颇高，其工作情况、文学创作以及迁转情况的研究仍是空白。唐代的基层官职种类不少，有释褐为太乐丞者，如诗人王维；或从太常寺太祝起家，如诗人张籍。但这类事例不多见，这些官职也比较不重要。在县官方面，唐人也有从主簿甚至县丞、县令起家，但最多的还是从县尉干起。县尉也是县官当中人数最多的一个群体，史料中屡见不鲜，不容忽视。在州官当中，士人刚出来做官，最常任的就是州参军和各曹判司。至于中晚唐的幕职，唐人一开始入幕最常担任的便是巡官、推官和掌书记。这也是基层幕职当中最重要的三个。^④而最常见到的情况，是他们许多从校书郎和正字出身。这两种官也被杜佑和封演称为美职，被白居易誉为“公卿之滥觞”。校书郎虽为九品小官，但也处于学士之列。因此被任命为校书郎一职会给士人带来很高的荣誉和声名。从一些文献资料可知校书郎的仕宦前景极佳，不少人由此官不断升迁并拜相。以前有关制度方面的研究大多侧重于史学的范畴，从唐代校书郎入手来进一步考察唐代校书郎与文学发展的关系问题，目前仍是一个鲜有人涉足的领域。因此，选取这一课题，能

① 胡沧泽：《唐代御史制度研究》，文津出版社 1993 年版。

② 郁贤皓、胡可先：《唐九卿考》，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03 年版。

③ 毛蓄：《唐代翰林学士》，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00 年版。

④ 赖瑞和：《唐代基层文官》，中华书局 2008 年版。

更好地揭示唐代文学研究进程中的某些原生态现象，还原那些原本被遮蔽的文学状况。本书拟通过对唐代校书郎与文学创作的关系研究，从新的路径来透视唐代文学，深化和拓展唐代文学研究。

第二节 学术史回顾

关于唐代校书郎与文学，至今尚未见系统的研究。唐代秘书省、弘文馆、崇文馆、集贤院、司经局五馆，皆有校书郎之职。校书郎的设置时间、品秩、员数，诸馆不尽相同。与此相关的研究有一些，但大都夹杂在一些文史论著中。笔者在阅读专著、搜集资料的过程中，也是从制度、史学方面入手，一点一点积累，逐渐接近和发现研究对象。相关的论著主要包括以下几方面内容：

首先，有关政治制度与文学方面，主要采用文史结合的研究方法。

程千帆的《唐代进士行卷与文学》^①一书对唐代进士试期间的行卷之风与文学的关系进行了研究。傅璇琮的《唐代科举与文学》^②将唐代科举作为一种制度予以完整考察，使与此相关的士子的生活和创作一并纳入其视野之内，为我们展示了一幅幅生动逼真的唐代文化、官吏铨选制度与知识分子生活、创作、社会习俗的画卷。戴伟华的《唐代幕府与文学》^③是研究唐代幕府制度与幕府文人创作关系的力作，书中展示了唐代幕府的基本面貌和文人入幕的心理状态，入幕在文人生活中占据很重要的位置，幕府深刻地影响着文学家的创作。王勋成的《唐代铨选与文学》^④提出唐代士人科举及第之后只是取得了做官的资格，不能马上授官，还需要经过吏部的铨试，守选之后就可以参加吏部的冬集铨选，三铨铨试即可以注拟授官。该书从史学和文学结合的角度探讨了唐代铨选与文学的关系。胡可先的《中唐政治与文学》^⑤是以永贞革新为研究中心，有侧重地论述了中唐政治与文学的关系及其文学演进的规律。李福长的《唐代学士与文人政治》^⑥选

① 程千帆：《唐代进士行卷与文学》，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版。

② 傅璇琮：《唐代科举与文学》，陕西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

③ 戴伟华：《唐代幕府与文学》，现代出版社1990年版。

④ 王勋成：《唐代铨选与文学》，中华书局2001年版。

⑤ 胡可先：《中唐政治与文学》，安徽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

⑥ 李福长：《唐代学士与文人政治》，齐鲁书社2005年版。

取秦府文学馆学士、弘文馆学士、北门学士、集贤学士、翰林学士等为研究对象，探讨了学士与政治的关系。傅绍良的《唐代谏议制度与文人》^①以谏议制度运作过程与文人文学活动的关系为着眼点，探讨了文人在具体的政治身份背景下的创作活动。马自力的《中唐文人之社会角色与文学活动》^②分别从制度层面、心理层面和文学创作层面讨论了中唐翰林学士、郎官、谏官、州郡官等社会角色的基本特征、职事活动和文学活动，试图从一个侧面揭示中唐的社会变迁与文学演进之间的互动关系。吴夏平的《唐代制度与文学研究述论稿》^③围绕“制度诗学”展开，试图从宏观视野进行“制度与文学”的学理探究，在分析研究现状的基础上寻求新的突破。李德辉的《唐宋时期馆驿制度及其与文学之关系的研究》^④探讨馆驿制度与文学的关系，可为古代文学研究提供新的视点和结论。宁欣的《唐史识见录》^⑤从选举与政治社会、经济视野下的城乡社会两个方面对唐代科举制度、官吏管理体制以及社会状况进行了阐述。一些期刊文献也进行了政治制度运作与文人文学活动的相关性研究。孙福轩、张景臣的《唐代科举铨选考试方法与评价标准述评》^⑥分析了唐代科举、铨选考试方法，礼部常科的选才标准之争本质上是重文学与重经史之争，吏部选试的取材标准之争本质上是重知识积累与重实践能力之争。任红敏的《唐代选官制度及社会风尚对唐判创作的影响》^⑦论述唐代所特有的注重判词写作的选官制度以及社会风尚促成了判文本身的成熟和兴盛。李福长、丁侃的《唐代文治化趋势与唐宋社会转型》^⑧提出随着科举制的推行，文学治国理念深入人心，唐朝政治主体结构发生了异质性的变迁，呈现出明显的文治化趋势，而这种变迁是唐宋社会转型的重要体现。

① 傅绍良：《唐代谏议制度与文人》，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年版。

② 马自力：《中唐文人之社会角色与文学活动》，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5年版。

③ 吴夏平：《唐代制度与文学研究述论稿》，齐鲁书社2008年版。

④ 李德辉：《唐宋时期馆驿制度及其与文学之关系的研究》，人民文学出版社2008年版。

⑤ 宁欣：《唐史识见录》，商务印书馆2008年版。

⑥ 孙福轩、张景臣：《唐代科举铨选考试方法与评价标准述评》，《河南社会科学》2008年第5期。

⑦ 任红敏：《唐代选官制度及社会风尚对唐判创作的影响》，《中北大学学报》2008年第5期。

⑧ 李福长、丁侃：《唐代文治化趋势与唐宋社会转型》，《许昌学院学报》2008年第1期。

其次，文馆制度与文学方面。

以文馆作为切入点来讨论，以往的研究更侧重于历史学和政治学。唐代秘书省、弘文馆、崇文馆、集贤院等都设置有校书郎一职，其设置时间、品秩、员数等诸馆各有不同。关于唐代秘书省的研究，赵永东的《谈谈唐代的秘书省》^① 对秘书省的机构沿革、藏书情况进行论述。曹之的《唐代秘书省群僚考略》^② 论证了唐代令狐德棻、魏征、虞世南、颜师古、马怀素、陈希烈、刘太真等人在秘书省的任职情况。对弘文馆、崇文馆、集贤院的制度性考辨，主要有李锦绣的《试论唐代的弘文、崇文馆生》^③ 围绕弘文、崇文馆生展开论述；牛致功的《唐代的学士》^④ 论述崇文馆、弘文馆学士和北门学士、翰林学士与唐代政治、文化的关系，学士为巩固唐代政权贡献了自己的力量，学士的文学创作丰富了唐代文化的内容。陈卫才、李德辉的《文馆起源与两汉藏书机构》^⑤ 论证两汉是文馆的形成时期。秦汉时期虽有着许多藏书机构，但并没有设置专职掌管图书的官署和官员。汉代宫廷藏书机构承担的任务是收藏和整理图书、修史、研讨当时重要学术问题、制定典章制度。何东、韩红梅的《初唐文馆与政府图书校勘职能》^⑥ 分析了初唐文馆的名称及文馆学士职能的变化，这种变化与盛唐时期图书校勘发展有莫大的关联。研究集贤院最珍贵的资料是唐代韦述的《集贤记注》，但原本已佚，现在所能看到的是宋代王应麟的《玉海》中所引的数十条。日本学者池田温的《盛唐之集贤院》^⑦ 从沿革、省舍、储藏、修纂、故实、职掌、禄廪、官联八个方面进行考察。郑伟章的《唐集贤院考》^⑧ 论述了集贤院创立始末和制度规模。李湜的《盛唐时期的集贤学士》^⑨ 认为集贤学士正式产生并兴盛于唐玄宗开元年间，

① 赵永东：《谈谈唐代的秘书省》，《文献》1987年第1期。

② 曹之：《唐代秘书省群僚考略》，《图书与情报》2003年第5期。

③ 李锦绣：《试论唐代的弘文、崇文馆生》，《文献》1997年第2期。

④ 牛致功：《唐代的学士》，《社会科学战线》1987年第1期。

⑤ 陈卫才、李德辉：《文馆起源与两汉藏书机构》，《湖南科技学院学报》2006年第3期。

⑥ 何东、韩红梅：《初唐文馆与政府图书校勘职能》，《河北师范大学学报》2007年第3期。

⑦ [日] 池田温：《盛唐之集贤院》，载《唐研究论文集》，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年版。

⑧ 郑伟章：《唐集贤院考》，《文史》1983年第19辑。

⑨ 李湜：《盛唐时期的集贤学士》，《江西师范大学学报》1995年第3期。

它既是隋唐以来科举制度发展兴盛的必然产物，也是唐朝文人政治局面形成的标志。集贤学士担当起了从理论上全面总结唐朝社会转型时期政治制度的重任。开元年间以后，集贤学士制度即趋于衰落。

近几年有关文馆制度与文学的研究主要有：李德辉的《唐代文馆制度及其与政治和文学之关系》^① 考察了唐代文馆的发展演变历程，通过对文馆学士群体的研究，对当时的文坛风气，文馆及文馆学士的相互关系，文馆和政治、文学的关系问题作了深入探讨，为唐代政治史、文学史、职官史的研究提供了参考。吴夏平的《唐代中央文馆制度与文学研究》^② 选择国子监、史馆、秘书省和崇文馆、弘文馆、集贤院、崇玄馆、广文馆等文化馆所作为研究的对象，将制度与文学结合起来，力图求证唐代中央文馆制度与文学之间的联系。葛立斌的《“兰台令史”与“东观校书郎”》^③ 认为兰台令史与东观校书郎皆是东汉时期承担校书工作的官职，但两者在发展源流、任职时间、任职条件、职能等方面有很大不同。兰台令史与东汉校书郎共同为汉代文化的发展作出了贡献。赖瑞和的《唐代基层文官》^④ 从唐人的生平、仕宦经历着手，论述唐人释褐之后最常担任的几种基层文官职务，即校书郎、正字、县尉、参军、判司、巡官、推官和掌书记等唐代职官制度的运作模式。胡珺的《论翰林学士与唐代文学的发展》^⑤ 说明翰林学士身负政治与文学的双重角色，以实践和理论两个层面影响着文人心态与文坛走向。吴夏平的《唐校书郎考述》^⑥ 对校书郎之员数和设置时间等进行了考辨。阎晓雪的《唐代文学侍从官研究》^⑦ 介绍文学侍从官员的演变过程为：弘文馆学士阶段、集贤院学士阶段、翰林学士阶段，比较了文学侍从官员三阶段在职责上的异同以及他们的选任标准和任职特色。此外，陈元锋的《北宋馆阁翰苑与诗坛研究》^⑧ 探讨北宋时期三馆秘阁与翰林学士院制度的设立与发展，探讨其政治与文化职能，考察

^① 李德辉：《唐代文馆制度及其与政治和文学之关系》，上海古籍出版社 2006 年版。

^② 吴夏平：《唐代中央文馆制度与文学研究》，齐鲁书社 2007 年版。

^③ 葛立斌：《“兰台令史”与“东观校书郎”》，《广东教育学院学报》2007 年第 6 期。

^④ 赖瑞和：《唐代基层文官》，中华书局 2008 年版。

^⑤ 胡珺：《论翰林学士与唐代文学的发展》，《前沿》2008 年第 9 期。

^⑥ 吴夏平：《唐校书郎考述》，《贵州文史丛刊》2005 年第 1 期。

^⑦ 阎晓雪：《唐代文学侍从官研究》，硕士学位论文，河北师范大学，2004 年。

^⑧ 陈元锋：《北宋馆阁翰苑与诗坛研究》，中华书局 2005 年版。

在馆阁翰苑的文化背景下，北宋知识精英阶层所特有的从政方式、生活状态及其群体性的创作趋向。成明明的《北宋馆阁与文学研究》^① 考察了北宋馆阁的沿革和馆职设置，描述了北宋馆阁文人的日常生活与文学，认为北宋的馆阁在继承唐、五代以来三馆的基础上有所发展，成为文化中心、学术中心和育才中心，在国家的政治、文化、文学活动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第三，文馆与文学方面的论述主要集中在诗歌方面，包括唱和诗集整理、律体律调分析、诗学著作考辨等。唱和诗集的整理方面，初唐唱和诗集的整理主要集中在《翰林学士集》、《珠英学士集》、《景龙文馆记》。陶敏的《〈景龙文馆记〉考》^② 对成书始末及版本流传等方面进行了考订。贾晋华的《唐代集会总集与诗人群研究》^③ 广引文献，主要考察了唐代七大集会活动与诗人群体的创作活动。作者将太宗时期、中宗景龙年间宫廷诗人群的唱和篇章及文学活动逐一考证，并论述了诗人集会酬唱诗对诗歌史的意义。

关于律体律调的探讨，较早研究唐诗律体律调的是郭绍虞先生，收录于《照隅室古典文学论集》^④ 中的《永明声病说》、《从永明体到律体》、《声律说考辨》等文章主要从五言诗音步的角度，说明“古”“律”之间的声律问题。赵昌平的《初唐七律的成熟及其风格溯源》^⑤ 考订初唐九次重要“七律”应制唱和组诗，认为七律的渊源当是蜕化于骈赋化的歌行。邝健行的《初唐五言律体律调完成过程之观察及其相关问题之讨论》^⑥ 从单句句调不合、失对联数、失黏首数、不合律首数等方面，考察初唐作家虞世南、李百药等人诗歌的声律状况，认为律调受到重视和探讨，主要是作者顺应文体本身的发展及从事探索的结果，跟君主的好文无关。葛晓音《论宫廷文人在初唐诗歌艺术发展中的作用》^⑦ 对宫廷文人在初唐诗歌艺

^① 成明明：《北宋馆阁与文学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07 年版。

^② 陶敏：《〈景龙文馆记〉考》，《文史》1999 年第 3 期。

^③ 贾晋华：《唐代集会总集与诗人群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1 年版。

^④ 郭绍虞：《照隅室古典文学论集》，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3 年版。

^⑤ 赵昌平：《初唐七律的成熟及其风格溯源》，《中华文史论丛》1986 年第 4 期。

^⑥ 邝健行：《初唐五言律体律调完成过程之观察及其相关问题之讨论》，《中国文化研究所学报》1990 年第 2 期。

^⑦ 葛晓音：《论宫廷文人在初唐诗歌艺术发展中的作用》，《辽宁大学学报》1990 年第 4 期。